

代际同居中的“边界”协商：以照顾孙辈为核心的代际合作与摩擦

余 健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6年1月30日；录用日期：2026年2月27日；发布日期：2026年3月11日

摘 要

在当代中国的家庭变迁背景下，因子女一代需要协助照顾第三代而引发的代际共居现象日益普遍。以孙辈照料为核心动因形成的多代同居，可视作一种代际合作机制，其运行过程伴随持续的边界协商。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12个三代共居家庭的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旨在揭示同居代际之间在物理空间、责任分工、情感卷入与家庭权力四个维度上的边界建构、协商与摩擦过程。研究发现，代际同居并非简单的“单方索取”，而是一种基于“相互需要”的互惠合作。然而，合作中“边界”的模糊性常常引发摩擦：在空间维度体现为私密性与共享性的冲突，在责任维度体现为科学育儿理念与传统经验之间的张力，在情感维度表现为亲密需求与个体独立之间的矛盾，在权力维度则体现为家庭事务决策主导权的竞争。这些摩擦的根源在于个体化进程中代际间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差异，以及“夹心世代”在多重角色压力下的资源分配紧张。有效的边界调适依赖于代际关系的亲密基础、沟通质量以及规则共识的形成，从而可能导向代际关系的相对平衡状态。本研究从微观层面呈现了当代中国家庭在结构变动中的调适过程与内在张力，为理解代际共居模式下的互动逻辑提供了经验依据，并对构建和谐代际关系及完善相关家庭支持政策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

代际同居，边界协商，隔代照料，代际合作，代际摩擦，家庭关系

The “Boundary Negotiation” in Intergenerational Cohabitation: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and Friction with the Care of Grandchildren as the Core

Jian Yu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family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model, formed to assist adult children in caring for the third generation (grandchildre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This living arrangement, centered on the core demand of “grandchild care,” is essentially a complex system of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fraught with ongoing “boundary” negotiations. This study employ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12 three-generation co-residing families, aiming to reveal the processes of boundary construction, negotiation, and friction between co-residing generation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physical space,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emotional involvement, and family powe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s not a simple case of “one-sided demand” but rather a reciprocal cooperation based on “mutual need”. However, the ambiguity of “boundaries” within this cooperation often triggers friction: conflicts between privacy and sharing over spatial boundaries, collisions between “scientific parenting” and “empiricism” over 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contradictions between intimacy and independence over emotional boundaries, and struggles over decision-making dominance regarding power boundaries. The root of these frictions lies in the differences in values and lifestyles between gener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ization, as well as the tension in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the multiple role pressures faced by the “sandwich generation”. Successful boundary negotiation relies on intimat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high-quality communication, and clear consensus on rules, ultimately leading to the ideal state of “triple-generati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provides a micro-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 adaptability and internal tens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ies and offers insights for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improving family support policies.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Boundary Negotiation, Grandchild Care, Intergener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generational Friction, Family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快速而深刻的人口与家庭转型。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居住形态以及双职工家庭模式的普遍化，传统的家庭育儿功能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一种以“照顾孙辈”为关键纽带的新型代际共居模式应运而生并广泛存在。与传统的以“赡养老人”为核心的共居模式不同，这种模式的动力轴心发生了代际下移，其主要目的是整合祖辈的闲暇时间、育儿经验与情感资源，以应对子代家庭在儿童抚育、家务分担乃至经济支持方面的现实压力。全国性调查数据表明，代际互惠的合作型同住已成为当前中国家庭居住安排的主流形态之一。[1]

这种居住安排表面上实现了“老有所为”与“幼有所育”的家庭策略性互补，构成了一个功能性的合作联盟。然而，亲密无间的共居空间并未消弭代际间的差异，反而使不同世代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育儿理念等方面的潜在分歧变得日常化与具体化。同居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持续的“边界”协商场域。

这里的“边界”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学概念，它不仅指涉物理空间的划分(如房间、物品归属)，更涵盖责任与劳动的分配(如谁负责喂养、谁主导教育)、情感的亲疏尺度(如干预与尊重的限度)，以及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力(如育儿方式、家庭开支的话语权)。边界的模糊、重叠与侵犯，是家庭摩擦最主要的来源。

既有研究对代际共居的动因、其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以及对子代婚姻稳定性的效应等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例如，张波等人的研究则警示，代际同居可能通过复杂的互动增加子代的离婚风险[2]。史珈铭的研究指出，照料孙辈能促进“夹心世代”祖辈的心理健康，彰显了这种合作的潜在福祉[3]；而这些研究多从宏观结果或单一主体视角出发，对于同居家庭内部微观的、过程性的互动机制，尤其是围绕“边界”进行的日常协商与调适，仍缺乏深入的刻画。陈富美关于“正向带孙”的研究触及了代际关系与教养介入等核心边界问题，指出祖父母不介入父母教养是达成“三代共荣”的关键，但这恰恰是实践中最难协商的部分。

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我们将深入代际共居家庭的日常生活内部，聚焦于以照顾孙辈为核心任务的合作场景，系统探究以下问题：代际双方如何在共居空间中建构与协商物理、责任、情感与权力的边界？这些边界协商过程中的主要摩擦点是什么？哪些因素促进了边界的清晰化与合作的和谐，哪些因素又导致了边界冲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本研究试图揭示当代中国家庭在应对社会压力时所展现出的弹性、创造力及其内部张力，为理解家庭现代化进程中的“变”与“常”提供一个生动的注脚。

2. 理论框架与分析视角

要深入理解代际同居中的边界协商，需要融合家庭社会学与微观互动论的理论视角。本研究主要借鉴以下两个理论框架作为分析基础。

2.1. 家庭现代化理论下的代际合作与互惠

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曾预言，工业化与城市化将导致扩大家庭瓦解，代际关系疏离，核心家庭成为普遍模式。然而，东亚社会的家庭变迁轨迹对此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家庭实践显示出强大的“文化韧性”，代际间的紧密联系与合作并未随着现代化而消失，而是以新的形式延续和重构。当代的代际共居，尤其是以抚育孙辈为目的的共居，可被视为一种“合作式家庭主义”的体现。它并非传统孝道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基于代际双方现实需求的策略性选择。对于子代而言，这是应对高昂育儿成本、缺乏普惠托育服务以及激烈职场竞争的压力缓解机制；对于亲代而言，这既是履行“责任伦理”(继续为子女奉献)的文化惯性使然，也是获取情感慰藉、实现“老有所用”价值的重要途径。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代际互惠，它超越了单向的“抚养-赡养”反馈模式，演变成为一种更具弹性和协商性的资源交换与合作联盟。

2.2. “边界”作为分析代际同居的核心概念

“边界”概念为我们分析这种合作联盟内部的动态互动提供了精细的工具。在社会学意义上，边界是区分社会实体、类别、群体或关系的符号或物理标志。在代际共居家庭中，边界管理是维持系统平衡的核心工作。我们将其操作化为四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区别的分析维度：

物理空间边界：指居住空间(如卧室、客厅、厨房)的划分、使用规则与隐私范围。共居意味着私人空间的压缩与公共空间的共享，如何界定“谁的领地”是首当其冲的协商议题。

责任与劳动边界：指围绕孙辈照料(如喂养、起居、接送、教育)和家务劳动(如做饭、清洁)的具体分工、责任归属与绩效标准。这是摩擦最频繁的领域，尤其体现在育儿理念的“代沟”上。

情感关系边界：指代际间情感联结的亲密程度、表达方式以及干涉限度。祖辈对孙辈的疼爱应在何

处止步，以避免“溺爱”或削弱父母权威？子代对祖辈的感激与对独立空间的渴望之间如何平衡？

家庭权力边界：指在家庭重大或日常事务(如育儿决策、家庭消费、生活安排)上的话语权、决策权和影响力分配。权力的消长与让渡，是边界协商中最具张力的一环。

边界的协商是一个持续的沟通、试探、冲突与调整的过程。借鉴职场代际和谐的研究，高质量的代际接触、清晰的互动规则对于减少冲突具有关键作用。在家庭场域中，这种协商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共居模式走向“三代共荣”还是“矛盾重重”。

2.3. 经济权力视角：房产所有权作为边界设定的核心资源

除上述四个边界维度外，经济权力——尤其是房产所有权的归属——构成了代际同居中边界划定的基础性结构变量。陈阳阳、纪浩基于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选择家庭养老方式的父母在代际资产分配中更倾向于非均等分配，赡养方式与财产继承之间存在清晰的互惠逻辑[4]。在住房商品化程度高、房价高企的当代中国城市，房产不仅是栖身之所，更是家庭财富的核心载体与代际转移的关键标的物。谁拥有房产所有权，谁就在家庭权力格局中占据结构性优势地位。这种优势通过“产权话语权”转化为空间使用规则、责任分配标准乃至情感表达方式的界定权。有研究指出，代际同住并非单方索取，而是需求组合与策略选择的结果，其中住房资源的供需关系是影响亲子选择的关键变量。本研究进一步认为，房产所有权的分布模式直接塑造了代际边界的初始设定：产权方天然拥有“主场优势”，而非产权方则倾向于采取“客居策略”，这一权力落差贯穿边界协商的全过程。经济权力的显性或隐性在场，使得边界协商远非纯粹的情感互动或理念碰撞，而是一场嵌入财产关系的身份博弈。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旨在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描，揭示代际同居中边界协商的复杂过程、主体经验和内在逻辑。

3.1.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并辅以参与式观察。访谈提纲围绕上述四个边界维度设计，邀请受访者回忆和描述具体的互动事件、冲突情境及解决方式。参与式观察主要在受访家庭同意的条件下进行，观察日常互动、家务分工、育儿场景等，以获取超越访谈文本的细节信息。

3.2. 研究对象与抽样

本研究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在华北某大城市选取了12个三代共居家庭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因协助照料学龄前(0~6岁)孙辈而与子女(及配偶)共同居住至少半年的祖辈家庭。最终，我们对12位核心祖辈照顾者(10位祖母，2位祖父)、8位子代母亲和4位子代父亲进行了访谈。表1展示了核心受访家庭的基本特征：

Table 1. Research on basic family information

表 1. 研究参与家庭基本信息

家庭编号	共居时长	祖辈角色(受访者)	子代关系	孙辈年龄	居住房屋产权归属
F01	2年	外婆(退休教师)	女儿/女婿	3岁	子代购买
F02	1.5年	奶奶(退休工人)	儿子/儿媳	2岁、4岁	祖辈单位房
F03	3年	外婆(退休会计)	女儿/女婿	5岁	共同购买
F04	4年	奶奶/爷爷(均退休)	儿子/儿媳	1岁、6岁	子代购买
F05	0.8年	外婆(农村随迁)	女儿/女婿	1.5岁	租赁

3.3. 数据分析

所有访谈录音均转录为文字，与观察笔记一同导入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进行管理。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捕捉关于边界事件、感受和策略的初始表述；其次进行轴心式编码，将开放代码归类到空间、责任、情感、权力四个核心范畴下；最后进行选择式编码，梳理各范畴间的联系，构建关于边界协商动态过程的理论叙述。

4. 研究发现：边界协商的维度与动态

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显示，代际同居中的合作与摩擦紧密交织，其核心即体现为四个维度边界的持续协商过程。

4.1. 物理空间边界：私密与共享的冲突

居住空间的并置首先引发了对物理领地的重新界定。在多数家庭中，房屋产权归属(见表 1)为空间权力提供了初始基础，但日常使用才是协商的焦点。

本研究发现，根据房产所有权的不同，家庭内部形成了三种典型的空间权力模式：

(1) 子代产权型：祖辈居住在子女购买的房屋中，普遍呈现“客居者”心态。F01 的外婆反复强调“这是女儿女婿的家”，其空间行为表现出高度的自我约束——不进入主卧、不随意移动家具、不在客厅接待亲友过夜。这种“空间谦抑”并非完全自愿，而是产权弱势地位下的适应性策略。正如她所言：“住人家的房子，就要守人家的规矩。”(F01-外婆)在此类家庭中，空间边界的设定权高度集中于子代，祖辈仅能在被许可的范围内(如厨房、儿童房)行使有限自主权。

(2) 祖辈产权型：子代夫妻居住在祖辈房产中，则呈现“寄居者”的复杂心态。F02 的儿媳表示：“总觉得是在婆婆屋檐下，想添个婴儿围栏都得先问问，怕她嫌乱。”尽管她承担主要育儿劳动，但在空间改造、物品添置等涉及财产边界的事务上，仍需征得作为产权人的祖辈同意。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祖辈会策略性地运用产权优势——如 F02 的奶奶虽不直接干预儿媳的育儿方式，却常在家庭争执时以“这是我的房子”作为终结性话语。张波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代际支持与居住模式对离婚风险的复杂影响，本研究的发现为其提供了微观机制注解：产权引发的空间权力失衡，可能加剧代际紧张，进而波及子代婚姻稳定。

(3) 共同产权或模糊产权型：部分家庭采取共同出资购房或产权登记在两代人共有名下(如 F03)，空间边界的协商更为平等。F03 的外婆与女儿约定：“客厅是大家的，但主卧你们说了算，我的房间你们进来要先敲门。”这种清晰的“产权共有-空间分治”模式有效减少了摩擦。然而，更多家庭处于产权模糊状态——如房产为祖辈单位分配房改房，但子代支付了装修或部分购房款。汉努姆等人的系统综述指出，代际共居的满意度高度依赖于居住安排的“选择自主性”[5]。本研究的证据进一步表明：自主性的实质来源是产权清晰度与产权话语权的对等分配。

“主人的家”与“客人的家”：居住在子代购买房屋的祖辈(如 F01 的外婆)常怀有“客居”心态，虽承担主要家务，但在空间布置、物品处置上极为克制。“这是女儿女婿的家，我最多动动厨房和阳台，他们房间的东西我从来不碰。”(F01-外婆)反之，居住在祖辈房产中的子代(如 F02 的儿媳)则可能感到自主权受限，“总觉得是在婆婆屋檐下，想添个婴儿围栏都得先问问，怕她嫌乱”(F02-儿媳)。

公共空间的规则制定权：客厅、卫生间等公共区域的使用规则成为微权力角逐场。祖辈倾向于维持整洁、安静和固定的作息，而子代及孙辈的活动则带来“混乱”与噪声。F04 的奶奶抱怨孙子玩具铺满客厅，而儿媳则认为“家就是让孩子玩的地方”。最终，他们协商出“每晚睡前共同收拾”的规则，划定了混乱的时空界限。

隐私的挑战：隔代共居最易侵蚀个人隐私。年轻夫妇的亲密互动、私人谈话可能因空间通联而受限；祖辈的社交生活(如老友来访)也可能因子代家庭的在场而调整。这种物理隐私的相互渗透，是情感边界紧张的重要源头。

4.2. 责任与劳动边界：“科学”与“经验”的碰撞

育儿是合作的核心，也是责任边界摩擦最剧烈的领域。其冲突本质是现代育儿知识体系与传统养育经验之间的权威之争。

分工的模糊性与超载感：尽管多数家庭有模糊分工(如祖辈负责日间照料、家务，父母负责晚间陪伴、教育)，但边界极易被“需求”突破。孩子的一声哭闹，可能立刻引发“谁该去处理”的瞬间判断。祖辈，尤其是祖母，常因“全天候待命”而产生劳动超载和身心疲惫，这与“照料孙辈促进心理健康”的普遍结论形成复杂对照。

育儿实践的标准之争：这是最经典的摩擦场景。关于“该穿多少衣服”、“能否吃零食”、“如何管教哭闹”等问题，两代人往往持有不同标准。一位坚持“科学育儿”的母亲描述：“我按书上说宝宝手凉正常，外婆非觉得是冷，一遍遍加衣服，为这个我们吵过好多次。”(F03-女儿)祖辈的经验权威受到子代从网络、书籍获取的“科学权威”的挑战，导致责任边界不仅仅是“谁来做”，更是“按谁的标准做”。

“帮忙不越位”的理想与困境：陈富美的研究指出，祖父母不介入父母教养是实现三代共荣的关键。但在现实中，承担主要照料的祖辈很难完全置身事外。“看到闺女对孩子太严厉，我心疼，忍不住要说两句。知道不该插手，但忍不住。”(F01-外婆)责任与情感在此交织，劳动边界因情感卷入而变得模糊。

4.3. 情感关系边界：亲密与独立的张力

代际之间因血缘和共同生活产生深厚情感，但过密的情感联结可能侵蚀子代核心家庭的独立性。

祖孙隔代亲与父母权威的消长：祖辈对孙辈的宠溺常是无条件的，这容易消解父母立下的规矩，形成“教育联盟”的破裂。一位父亲无奈地说：“我们罚站，孩子转头就去找奶奶抱，奶奶一边抱一边说‘他们坏’，我们一点办法没有。”(F04-儿子)祖辈通过情感付出赢得了孙辈的亲密，却可能无意中跨越了教养权力的边界。

子代的感恩与愧疚：子代对祖辈的付出普遍心怀感激，但这种感激伴随着因占用父母晚年自由而产生的愧疚感，以及因意见不合发生冲突后的负罪感。“我妈这么辛苦，我还老嫌她方法不对，吵完自己也难受。”(F03-女儿)这种复杂情感使得子代在维护自身育儿主权时常常犹豫不决。

夫妻关系的挤压：密集的代际互动可能挤压年轻夫妻的独处时间和情感交流空间。一些冲突会从育儿分歧蔓延至夫妻关系，如丈夫在母亲与妻子之间难以调停，这正是张波等研究中代际同居可能增加离婚风险的微观机制体现。

4.4. 家庭权力边界：决策权的隐性争夺

权力边界渗透于以上所有维度，体现在家庭事务的最终决策权上。

重大支出的决策：房屋、汽车、大型儿童用品等消费，谁拥有主要话语权？产权方通常占优，但也需顾及家庭和谐。在F03(共同购买)的家庭中，这类决策往往需要家庭会议式的协商。

育儿方式的决定权：这是权力争夺的焦点。理论上，父母是法定监护人，拥有最高决策权。但在依赖祖辈劳动的实际中，权力不得不发生让渡和分享。成功的家庭会发展出“领域分割”的默契，例如“吃饭睡觉外婆管，上什么兴趣班爸妈定”。

生活节奏的主导权：家庭的作息时间、饮食口味、娱乐方式以谁为主导？通常，主要照料者的节奏会成为家庭主节奏。当祖辈掌厨，饮食可能更传统；当子代周末主导，家庭活动可能更现代。权力的平

衡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节奏交替之中。

4.5. 经济权力的显性化：房产所有权与决策话语权的转化机制

家庭权力边界不仅体现在育儿方式、生活节奏等日常领域，更深层地受制于经济资源的控制权。房产所有权作为家庭内部最大宗的资产形态，其归属直接决定了重大决策中的话语权分配。

(1) 重大支出的决策权分层。本研究发现，在涉及房屋买卖、装修、抵押贷款等与房产直接相关的事务上，产权方拥有绝对主导权。F04 的祖辈虽与子代同住，但房产为子代独立购买，当子代计划置换更大住房时，祖辈仅有知情权而无决策权。反之，在 F02(祖辈产权)家庭，祖辈对子代申请消费贷款、购买汽车等行为保持了较强的干预倾向。“他们要买车，我说不行，贷款谁还？这房子是我的，将来都是他们的，但现在不能乱花钱。”(F02-奶奶)这一话语将产权继承预期转化为当下的监督权力。

(2) 育儿决策中的权力借代。值得关注的是，房产所有权的影响力会“溢出”至育儿领域。F05 的家庭租住在子代工作地附近，外婆从农村随迁进城照料外孙。由于没有房产，她在与女儿女婿的育儿分歧中几乎完全退让。“人家城里人讲究科学，我不懂。说多了怕他们烦，把我送回老家就见不到外孙了。”(F05-外婆)在这里，产权的缺失被内化为话语权的自我削弱，形成“无产-失语”的心理关联。奥佐利娜等人关于代际协作的研究指出，清晰的规则是减少冲突的关键[6]，但本研究发现，当经济权力落差过大时，弱势方往往难以主动发起规则协商。

(3) 遗产预期与当下的权力让渡。部分祖辈主动让渡部分决策权，其动机隐含对“未来回报”的期待——即通过当下的顺从换取子代未来的赡养承诺或房产继承中的优先考量。这种“权力预支”机制在陶涛等学者讨论的代际互惠模式中已有理论线索。F03 的外婆坦言：“这房子我们老两口出了一半钱，以后肯定留给女儿。现在听他们的，他们也记着我的好。”经济权力在此并非单向支配，而是嵌入于长时段的代际互惠循环。

4.6. 边界协商失败的负面案例：从摩擦到分居

前文的分析揭示了许多家庭通过持续的边界协商实现了相对和谐的代际共居。然而，并非所有家庭都能成功完成这一调适过程。边界协商的高度情境性与脆弱性意味着，当某些关键条件缺失或恶化时，摩擦可能升级为冲突，冲突可能演变为关系的彻底破裂。本研究在抽样过程中接触了 3 个因代际同居矛盾激化而最终分居的家庭，其中 2 个家庭接受了深度访谈。本节选取最具代表性的 F06 家庭作为负面案例，通过对其协商失败过程的深描，反向验证边界协商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

案例深描：F06 家庭——“产权是我的，但家没了”。

F06 家庭的基本情况：祖辈(奶奶，68 岁，退休国企职工)独居于市中心一套三居室房改房，产权登记在奶奶名下。子代(儿子，38 岁，公司职员；儿媳，35 岁，小学教师)原租房居住，2019 年生育二胎后，因育儿压力与托育费用考量，接受奶奶提议，携长女(6 岁)与幼子(1 岁)迁入奶奶家中共同居住。共居时长 2 年 4 个月，于 2022 年 6 月分居，子代家庭搬出另行租房，祖孙三代关系陷入长期冷淡。

(1) 共居初期的边界预设与隐性张力

共居伊始，奶奶即明确表达产权立场：“这是我的房子，你们住进来是帮我热闹热闹，也是给你们减轻负担。”(F06-奶奶)子代夫妻对此心怀感激，儿媳表示：“婆婆主动开口让我们住，我们很感激，也想着要多分担家务、好好孝顺她。”(F06-儿媳)然而，这一边界预设隐含了权力分配的单向性：产权方将子代的入住界定为“被帮助”而非“合作”，子代则在“感恩”话语下难以平等提出边界诉求。

空间边界上，奶奶保留了最大的主卧，将两个次卧分配给子代夫妻与两个孩子。但客厅、厨房、阳台等公共区域的使用规则从未明确讨论。奶奶习惯早睡早起，晚间九点后要求电视静音、孩子不得跑动；

子代夫妻因工作性质需晚间处理事务，孩子作息也较晚，屡屡触犯“软性禁令”。儿媳回忆：“她不说重话，但每天九点就站在客厅门口叹气、看钟，那个压力比骂人还难受。”(F06-儿媳)

(2) 责任边界的持续侵蚀与权力借代

育儿分工最初约定：奶奶负责白日照料幼子，子代负责晚间与周末。然而，奶奶对孙辈的教养介入不断溢出责任边界。她坚持用咀嚼过的食物喂养幼儿、反对使用纸尿裤、频繁干涉孙女的学习习惯，并以“我带了三个孩子，个个健康”为由拒斥儿媳的科学育儿建议。儿媳尝试沟通，奶奶的典型回应是：“这是我的孙子，我还能害他？你们年轻人就是书看多了。”(F06-奶奶)

值得注意的是，奶奶的策略性运用了产权话语来强化其在育儿领域的权威。在一次关于孩子是否应继续上兴趣班的争执中，奶奶以“你们每个月交我 2000 块伙食费，哪还有闲钱乱花”直接否决议题。此外，产权优势转化为对子代家庭支出的监督权，进而介入核心家庭的财务边界。张波等人的研究指出，代际支持若伴随过度的权力介入，可能成为婚姻不稳定的风险因素。F06 家庭的演变印证了这一机制：儿媳逐渐感到“在这个家里，我们不是成年人，是借住在婆婆屋檐下的孩子”(F06-儿媳)。

(3) 情感边界的耗竭与沟通通道的关闭

共居进入第二年，代际关系进入“冷战-爆发”的恶性循环。日常沟通缩减为必要的事务性对话，情感表达趋于冻结。儿媳减少回家时间，主动承担更多加班；儿子夹在母亲与妻子之间，初期尝试调解，但屡屡因“你到底向着谁”的双向指责而挫败，最终采取回避策略。

关键的破裂事件发生于 2022 年 4 月。幼子高烧惊厥，儿媳坚持立即送医，奶奶主张“捂汗退烧，去医院折腾孩子”，并拦住大门。儿媳情急之下推开婆婆，带子就医。当晚，奶奶宣布：“这是我的房子，你们不尊重我，就搬出去。”(F06-奶奶)此后的两个月内，尽管儿子多次斡旋，但双方均未就核心矛盾进行实质性沟通。奶奶坚持“他们必须认错”，儿媳则认为“我们只是借住，认了错也永远是寄人篱下”。2022 年 6 月，子代家庭搬出，祖孙三代见面频率从每日降至每月不足一次，孙辈与奶奶的情感联结显著淡化。

4.7. 反向验证：边界协商失败的关键变量

F06 家庭的悲剧性分居并非突如其来，而是边界长期失谐、协商机制完全失效的必然结果。通过与成功协商家庭的对比，我们可以反向识别出边界协商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

(1) 产权权力需要被“软化”而非“硬化”。在成功家庭(如 F01、F03)中，产权方有意识地淡化所有权的话语宣示，转而强调“共同经营家庭”的合作叙事[7]。F01 的外婆虽居子代房产，但女儿女婿通过“这是你的家，不是客人”的情感邀请，消解了产权落差。反观 F06，奶奶反复硬化产权边界，将产权话语用作冲突中的终极武器，陆林等人的研究指出，老漂族在子女家中处于“不平衡的代际互动关系”之中，真实情感需求被忽视，根植性的家成为“回不去的地方”，使得任何边界协商都笼罩在“寄居者”的阴影之下。罗纳德等人的跨国研究指出，住房产权在代际关系中的意义取决于其被“赠予化”还是“资本化”[8]；本研究进一步表明，将产权“赠予化”处理——即弱化排他性所有权、强调代际共有的居住权益——是化解权力落差的必要策略。

(2) 责任分工需要清晰的规则共识，而非模糊的情感预期。F06 家庭从未就育儿理念分歧建立任何规则性协商机制。每次冲突均以情绪爆发或单方退让收场，未能沉淀为双方认可的行为准则。本研究的负面案例反向证明，一旦祖辈持续越界且双方无法划定明确的责任边界，合作必然走向崩溃。

(3) 情感联结需要冲突修复的仪式化通道。成功家庭在冲突后会通过道歉、补偿性关怀、幽默化解等方式修复情感裂痕[9]。F06 家庭则缺乏任何修复机制。一次冲突的未解决情绪积累为下一次冲突的引爆点，最终情感账户完全透支。德鲁里等人关于代际接触质量的研究指出，高质量的接触需要平等的地位、

合作性的目标与制度性的支持[10]；F06 家庭在上述维度上全面缺失。

(4) 子代夫妻联盟的强度是缓冲代际冲突的核心屏障。在 F06 家庭中，儿子长期处于调解失败的角色困境，未能与妻子形成稳固的共同战线。对比成功家庭(如 F03)，女婿明确表态“育儿的事听我老婆的，妈你帮忙就好”，在代际边界前筑起夫妻联盟的防火墙。张波等人的研究揭示，代际同住对离婚风险的影响存在条件性；本研究的证据表明，夫妻联盟的强度是这一条件性的关键构成。

5. 讨论与建议：迈向有清晰边界的代际合作

本研究发现，以育儿为核心的代际共居是一个高度动态的“边界工作”过程。合作的成功并非源于边界的消失，恰恰相反，它依赖于双方对边界的共同认知、尊重与成功协商。这与职场中通过明确角色、高质量接触来减少代际冲突的逻辑异曲同工。

5.1. 边界摩擦的根源与现代性困境

首先，摩擦的深层根源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的代际价值张力。纪莺莺、阮文雅的研究对此提供了精辟的理论概括：代际共育中的冲突，本质上是“个体”本位与“一体”本位的伦理交锋。中间一代追求培养“现代个体”的育儿目标，自觉反思自身童年经历，这造成了与祖辈观念的“显性断裂”；然而，当他们面临现实的家庭平衡压力时，又不得不“隐性承袭”亲子一体的传统伦理资源[11]。这种断裂与承袭的交织，正是代际边界协商始终处于动态不稳定状态的文化根源。子代更强调个人主义、科学育儿和核心家庭的独立性；祖辈则更看重家庭集体主义、实践经验和代际的浑然一体。共居使两种现代性方案在同一物理空间内短兵相接。其次，“夹心世代”的祖辈自身面临健康老龄化与继续奉献的角色冲突，他们的付出虽获得心理回报，但持续的责任超载也可能损害其福祉，造成“代际失衡”的风险。最后，社会支持的缺位(如普惠托育不足)将家庭逼向内部消化压力，放大了内部摩擦的烈度。

5.2. 促成和谐协商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相对和谐家庭(如 F01、F03)的分析，我们识别出促成成功边界协商的要素：

清晰的初期沟通与规则预设：在共居前或初期，就关键问题(如育儿分工、花费承担、隐私尊重)进行坦诚沟通，建立基本规则，能预防大量摩擦。

“领域隔离”与“权威分区”策略：家庭在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你管这块，我管那块”的默契，能有效减少日常决策冲突。尤其在育儿上，划分明确的决策领域至关重要。

高质量的情感联结与沟通方式：基于亲密感情和相互感恩的基础，冲突更可能以建设性方式解决。使用“我讯息”(表达感受而非指责)和就事论事的沟通，比指责对方“不对”更有效。

子代夫妻的紧密联盟与共同担责：子代夫妻需要首先达成一致，作为一个团队与祖辈沟通，避免祖辈陷入“夹在夫妻之间”的困境，同时也能减轻祖辈的劳动负荷。

5.3. 政策启示与社会支持

家庭内部的调适能力有其限度，外部支持系统至关重要

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这是从根本上缓解家庭育儿压力、降低对代际照料过度依赖、从而减少家庭内部摩擦的治本之策。

推广社区“代际融合”与育儿指导服务：社区可组织活动，增进代际理解，并为祖辈提供现代育儿知识培训，帮助其更新知识体系，缩小“经验”与“科学”的鸿沟。

认可与支持家庭照料者的劳动：通过社会宣传、喘息服务、心理支持等方式，认可隔代照料者的社会价值，保障其身心健康，避免其因长期照料而陷入孤立与耗竭。

5.4. 经济权力的不对称与边界协商的不平等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之一是：房产所有权的分布制造了代际同居家庭中系统性的“边界设定权”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通常以隐性方式运作——产权方无需频繁宣示所有权，其话语天然具有更强的“正当性”；非产权方则内化了客居身份，形成自我审查与边界收缩。史珈铭关于“夹心世代”健康影响的研究提示我们，祖辈的照料付出并不必然带来权力地位的提升；本研究的证据进一步表明，若无产权加持，祖辈的劳动贡献难以转化为同等分量的家庭话语权。

这种不平等对代际关系产生双重效应：一方面，清晰的产权归属有助于减少关于“谁说了算”的无谓争执——正如德鲁里等人关于代际接触质量的研究所言，明确的角色设定有助于降低冲突；另一方面，过大的权力落差可能抑制弱势方的诉求表达，使表面平静的家庭生活掩盖深层的不满积累。陈富美提出的“三代共荣”理想状态，其达成条件不仅包括祖辈不介入父母教养，更需要经济权力结构的相对均衡——或至少，弱势方能够通过其他资源(如情感价值、劳动贡献)获得补偿性的权力认同。

5.5. 政策启示：超越家庭内部的产权依赖

本研究的经济权力视角揭示了代际同居安排对私有房产制度的深度依赖。在当前公共托育服务供给不足的背景下，家庭被迫通过“捆绑居住”来整合照料资源，而房产所有权则成为这一捆绑关系中的核心筹码。缓解由产权不平等引发的代际摩擦，不能仅依赖家庭内部的沟通技巧提升，更需要社会政策层面的结构性干预：

第一，发展普惠性托育与老年照护服务，降低家庭对代际居住捆绑的刚性需求，使照料安排与居住安排可以适度脱钩。

第二，探索多元化的代际居住支持政策，如“多代屋”社区规划、代际租房补贴、适老化改造补贴等，拓宽家庭居住模式的选择集，减少对单一私有产权结构的依赖。

第三，加强对非产权照料者的法律与社会保护，在家庭政策中承认并补偿祖辈照料劳动的社会价值，避免其因产权弱势而陷入“寄人篱下”的心理弱势。

6. 结论

本研究深入描绘了因照顾孙辈而代际共居的家庭中，围绕空间、责任、情感与权力所展开的微妙而复杂的边界协商图景。这种居住安排是现代中国家庭面对结构性压力时展现出的强大适应性与策略智慧的体现，是一种基于“相互需要”的深度互惠合作。然而，合作中必然伴随着边界摩擦，这是个体化趋势与传统家庭伦理、科学话语与传统实践、核心家庭独立性与代际互助依赖性之间张力的日常展演。

理想的代际合作并非回归边界模糊的传统大家庭，而是在承认代际差异与个体需求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沟通与调适，建构起既有清晰界限、又能弹性互助的新型代际亲密关系。这要求家庭成员具备更高的“边界意识”与协商能力。同时，社会政策应当超越将家庭视为纯粹私人领域的观念，通过构建完善的家庭友好型社会支持体系，为家庭的内部协商提供更多资源与喘息空间，最终助力实现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达成真正的“三代共荣”。

参考文献

- [1] 陶涛, 钟雨奇, 黄静怡. “单方索取”还是“相互需要”——代际同住中的需求组合与亲子选择[J]. 社会学研究, 2022, 42(6): 214-240.
- [2] 张波, 丁金宏. 代际支持、居住模式与离婚风险——基于 CFPS2010-2020 年数据的微观证据[J]. 人口与发展, 2023, 29(3): 137-147.
- [3] 史珈铭. 均衡还是失衡: 中老年夹心世代的代际照料对其健康的影响[J]. 人口与发展, 2024, 30(6): 87-99.

-
- [4] Chen, Y. and Ji, H. (2024) Influence of Child Structure and Means of Eldercare on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Family Assets. *PLOS ONE*, **19**, e031292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312921>
- [5] 陆林, 王芳, 陈劫绮, 符丽君, 黄婷. 代际支持视角下老漂族“家”的重构与协商[J]. 地理研究, 2025, 44(10): 2862-2877.
- [6] Drury, L. and Fasbender, U. (2024) Fostering Intergenerational Harmony: Can Good Quality Contact between Older and Younger Employees Reduce Workplace Conflict?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97**, 1789-1812. <https://doi.org/10.1111/joop.12539>
- [7] 钟晓慧, 郭巍青. 新社会风险与城市家庭居住安排——基于住房产权视角的代际关系研究[J]. 社会, 2021, 41(4): 159-183.
- [8] Ronald, R. and Jin, M.Y. (2020) Homeownership, Family and the Gift of Housing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Housing Studies*, **35**, 1157-1177.
- [9] 陈映芳. 家: 中国人的居家与家庭生活社会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 [10] Hanum, L., Newcombe, P. and Scott, T. (2024)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between Older People and Adult Children. *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 **30**, 968-988. <https://doi.org/10.1080/13229400.2024.2363785>
- [11] 纪莺莺, 阮文雅. 显性断裂与隐性承袭: 从代际共育看家庭伦理的现代化[J]. 社会, 2024, 44(2): 61-97.